



王鼎铭画像

■人物小传

王鼎铭,字新之,号彝轩,生于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六月初一,死于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二月二十六日。祖籍山西太原,明万历间由山东费县迁至峯县(今山东枣庄市)。父鸿基,国子监生,家颇饶。鼎铭六岁随父、祖读书,勤奋好学。十五岁入郡庠,且学医道。二十一岁为贡生。二十三岁,始治产业,垦荒于山丘,售货于京、津,销煤至余杭,传沪、宁丝织于桑梓,引江南桑麻于峯地,家资渐厚。嘉庆二年,始留意武事,学兵法,读兵家秘笈。嘉、道年间,峯县多灾,鼎铭联合当地士绅出资赈灾,活人无数。嘉庆十三年,赴京应试,于途中识潍县陈官俊,多所扶助,且为其治病,交谊甚厚。十五年,鼎铭由廪贡援例得授内阁中书,旋充武会试同考官。十九年,例捐主事,后因母年迈,辞官归里。道光九年,鼎铭五十九岁,受荐而承上命,旋赴湖南新田任县令。

记忆

历史就在眼前

走访王鼎铭在新田留下的光辉足迹

■高煥成

2013年酷暑时节,有幸陪同中央电视台记者,坐高铁,乘飞机,三千里路云和月,风尘仆仆来到一代廉吏王鼎铭曾任知县的湖南新田县走访王氏故居。短短三天的采访,王鼎铭在新田留下的光辉足迹,以及新田人民对他的衷心爱戴、深深怀念,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一代廉吏的为民情怀、丰功伟绩。第一站来到毛里乡窝塘村,年已82岁的村民周正柏热情接待了我们。在老人家中,至今保存着一本残损发黄的周氏族谱。打开族谱,第一页就记载了王鼎铭被杀一事:“有井(锦)田镇瑶人赵金龙,倡率聚众,自称王号……,把王大人脑插在大塘边,以脑埋在坪头,坐东向西。猖得兵器,助成踊跃,即到我村,于壬辰岁二月二十三停住三宵两旧(昼),退至茶林,将屋宇焚毁,鸡犬不留,实遭猖匪害切非浅,我等措手无力,族叔商议呈王县,详报事业,据凭求济,难民蒙朝廷恩发抚米,吩咐民等。道光十四年癸巳岁抄腾周氏宗谱一本,永远存据为根本。在场人:宋大伦、郑土保、周启贵等交。”

这段族谱记载的悲惨史实真是弥足珍贵,我们纷纷拍照留存,并嘱咐老人一定要好好保存下去。随后,周正柏老人带我们来到村中的一口大塘北面,他说这就是曾经埋葬过王鼎铭头颅的地方。一时间,点燃提前准备好的纸钱蜡炷香,开始了庄严的祭奠仪式。新田县政协原副主席胡士舜,枣庄文史专家郭明泉,王鼎铭第七代孙、山东华欣公司董事长王淑华先后当场致词发表感言。所有在场的人们,都深深地向王鼎铭墓地鞠了三个躬。

离开窝塘村,我们又驱车来到视头镇彭梓城村,村中至今仍存的明清民居祠堂让人惊叹不已。村支部书记彭建生在位于村中的犀牛沐浴井旁告诉我们,据村里老人讲,这就是道光11年新田大旱时,王县令下来治水,挖出的全县水源最好的井。道光23年又重修碑文,上书“共饮清泉惠,惟存改邑风”,字迹依然清晰可见。眼下虽然新田自6月中旬以来一直无雨,连续40余天大旱,但此井却一点旱相没有,依旧源远流长,泽被后人。

昔日的老县衙,今天已成为龙泉街道办事处办公地。院中的一棵300多年的樟树枝繁叶茂,生机勃勃。树下立着一块清代石碑,上书“总督湖广部堂恭示”,记载着清代官吏催交赋税应遵守的有关事项。完全可以想像得出,在县衙处理公务的王鼎铭,肯定会经常在这棵树下乘凉,与同僚一起共商新田大计。

老县衙附近的王公馆,墙上青砖还留着“道光十一年”的标记,是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建筑。一座小院,坐南朝北,两层阁楼,左右厢房,这就是昔日王县令与随从们的生活居所。没有宽敞庭院,没有高大楼房,处处显示的是俭朴、节约,正如新田县名士、也是王鼎铭亲手培养的最优秀的年轻学子、曾任广西左右江兵备道的张荣祖,在其撰写的《新田县知县王鼎铭专祠文》碑记中所说:“出宰新田,微行入境,三载未携家眷。”下车

以来,清白端正,载米而资宦囊,破金以资众瘠。”“饬躬既廉,自奉尤薄。”“月印干潭,六房如水”。

现已成为商家门市的火神庙遗址,仅存一座庙门。伫立门前,遥想道光十年(1830年)春,新田又遭大旱,“公乃自械而暴祷于城隍,不雨,又祷于火神,不雨”,于是王鼎铭亲自披枷戴锁,跪在烈日下,曝晒三日,边祈祷,边哭泣:“苍天在上,如果我王鼎铭有哪些对不起新田县百姓的地方,要罚就罚我吧,请不要祸害新田百姓。如果你再不下雨,我将长跪不起。”“是夕,云起东南竟至西北,瓢泼大雨自天而降。”王鼎铭为民求雨的诚心感动了上天,新田普降大雨,同时也感动了新田的老百姓。如今,王知县在火神庙前披枷求雨的故事仍在新田百姓中广为传颂。

在金陵镇,我们看到了一段古城墙,看到了义学堂,看到了衙门井。睹物思人,新田县原文化局副局长尹金堂激情满怀,向我们介绍了王鼎铭兴办义学、打井济民的生动故事。特别在最早立“天理、国法、人情”六字碑的地方,对这六个字的精髓进行了阐释。

原来,新田古称“南蛮之地”,民风剽悍,王鼎铭到新田上任时,南面械斗不断,北面案件层出不穷。针对这一情况,王鼎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天理、国法、人情”六字理念来教化新田人民。他说,新田之所以这样乱,主要是这里的人不开化,孔子谆谆告诫我们:要以德治国,以仁治民,这要成为一个规矩。于是,他首先将这六个字亲自书写后,用石碑刻好,安竖在每个村。并将《清帝圣谕》十六条,叫全体官员们抄写张贴到各村,明白昭示,让老百姓人人知道,自觉遵守。第二就是逐步开展圣谕宣讲活动,据记载:每逢朔望,必四乡开讲。用清帝“敦孝弟、笃宗亲、和乡党、重农桑、尚节俭、隆学校、黜异端、讲法律、明礼让、务本业、训子弟、息诬告、诫窝逃、完钱粮、联保甲、解仇忿”的正统思想来教化,成为贯彻六字理念的最佳注脚。

驱车来到大山深处的门楼下瑶族自治乡,禁不住被这里优美的生态环境所陶醉:好一个天然氧吧!瑶族乡亲的热情好客更让我们陶醉,他们唱着最动听的迎客歌,跳起最美的瑶族舞蹈,拿出家里最好的茶果点心,真情地向我们讲述着新田瑶民与王鼎铭的百年情结。

采访中得知,王鼎铭先后两次到过瑶乡。第一次,是他刚来新田时,进瑶山访贫问苦。当时,由于清政府的“山田升科”制刚刚出台,打破了瑶民几千年不纳税的格局,瑶民对朝廷极为不满。然而,王鼎铭到瑶山后,看到了瑶民“靠山吃山,刀耕火种”的艰难,不但没有收税,反倒将“卖了南北洛”的钱来资助瑶民,感化瑶民,得到了瑶民的尊重。第二次,也是王鼎铭的最后一次。他本已调任山西路安府知州,在上任途经长沙时,听说瑶王赵金龙起事,毅然返回新田,再赴瑶山,召集瑶长,劝他们不要造反,有什么大问题可以商量解决,新田大部分瑶民听从了王鼎铭的劝告,停止了起事行为。但在江华锦田起事的赵金龙势如破竹,所向无敌,很快就打到了新田,并打出了瑶王的旗号,瑶民们当然拥护自己的瑶王,所以,这一次奉劝以失败而告终。不过,虽然这次失败了,新田大部分瑶民却没有参加起事,幸免于难而得以繁衍生存下来。今天的瑶民,靠山吃山,家庭年收入均达10万元以上,都住上了两到四层的小楼房,过上了幸福生活。作为一名新田的好知县,广大瑶民言语中对王鼎铭一直念念不忘,心存感恩。

行程最后一天的晚上,我们专程采访了新田县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新田县志副主编黄思文。黄老先生也已82岁高龄,一提起王鼎铭,立即精神焕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谈起王鼎铭立传的根据:一是微行入境;二是拜庙不拜客;三是两次回家变卖家产济困;四是整肃衙风;五是轻装简从,自备伙食;六是普法规民,案无积牍;七是勤修农政;八是兴办教育;九是临危保民,殉职报国。经反复讨论,县志编委会确定王鼎铭为新田县志人物传第一人,报县委批准后,黄老先生的心情十分激动,即兴赋词一首:

卜算子·高风亮节万代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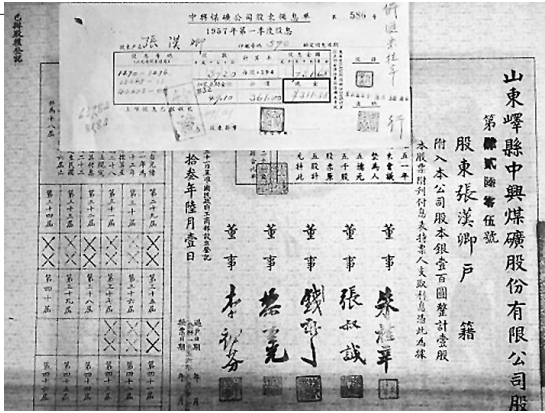
奉命任新田,不用骑和轿。察吏安民实政行,花雨春郊早。济困破家财,晚日甘霖到。殉职如归不二心,天下真难找。岁月不居,186年逝去,王鼎铭走过的每一个足迹,留下的每一个故事,都让我们抚今追昔,感慨无限。真没有想到,在新田仅仅三年,他却留下了这么多让新田人代代相传的光辉事迹。采访新田的群众,对王鼎铭都能说出一二,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口碑,难怪《新田县志》历史人物传把王鼎铭列在第一位。

历史就在眼前。新田的每一片瓦,都记载着王鼎铭爱民如子的动人故事。新田的每一块砖,都印记着王鼎铭勤政为民的丰功伟绩。“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一面镜子。传承历史优秀文化传统,能让我们了解过去,更好的去面向明天,开创未来,早日实现我们伟大的中国梦。

采访快要结束时,在茂家乡上井丰村,当年王鼎铭曾经任职过的地方,正巧碰到了前来察看早情的现任新田县长唐军。年轻的唐县长深情地望着这片沃土,表示一定要继承发扬好王鼎铭留下的优良传统,把新田建设的更加美好。

喜看今日新田,正逐步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一座现代化城市如初升太阳喷薄欲出。巍巍青云塔下,全国最大的孝文化公园内,“一代廉吏”王鼎铭与“黄埔三杰”蒋先云、抗日名将郑作民等上忠国家下孝父母的杰出代表一起,正日益感化教育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还有可喜的是,国家《清史》编委会已决定将王鼎铭入编《清史》,更成为枣庄和新田两地人民共同的骄傲。

斯人已去,风范犹存;一代廉吏,名垂青史!



中兴煤矿早期发行的股票,上面签名的股东张汉卿就是著名的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签押中兴公司档案的发现及评析

■胡安宇 胡乐浩

2013年是西安事变七十七周年,有关事变当事人的轶文轶事会较多地进入传播渠道。但至今为止在诸多张学良的传记或专著中,均未见到关于他青年时期在山东峯县中兴煤矿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公司)任职的记载。过去,枣庄矿务局一些从事中兴公司历史研究的人士也一直认为张学良在公司持有股份,并未到公司办公。2012年,在枣庄文化市场购到三卷中兴公司档案,其中经张学良亲笔签押的文牒就有8件。这批档案的发现,以铁的事实证明,张学良不仅在中兴公司任职,而且亲自到公司办公,签阅公司文件,处理公司事务,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因此说这一发现是改写张学良人生经历的重大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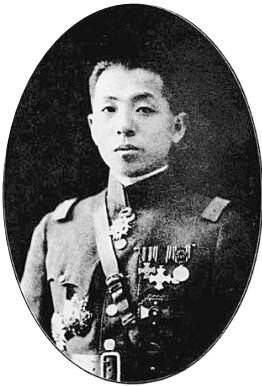
中兴公司始建于清末,是中国近代大型民族工业公司之一,解放前位居十大矿厂之列。近代著名军政要人徐世昌、黎元洪、张勋及张学良、朱启铃、钱新之等先后担任公司要职。解放后经公司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后收归国有,称为枣庄矿务局,现为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这次发现的三卷中兴公司档案,就是重要历史资料。经认真审核,认为这三卷档案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入档严格正规,且保存完好,三卷档案均为三眼订线装,字迹清晰,完整无损。三卷计收电函、文牒41件,每件入档文牒前均覆有公司专门印制的大红字封皮,封皮上标有编号、注明文稿发生的时间、内容、收发单位及经办人便于查阅。

二是签押认真,遗墨珍贵,在41件文牒的封皮或落款处均有公司要员的亲笔签押。其中包括朱启铃、袁祚庠、张仲平、陈景韩,最为可贵的是蜚声中外的张学良先生单独或与朱启铃、袁祚庠联袂签押了8件。之所以说是亲笔,有这样三条理由:(1)卷中六位公司首脑的签字运墨不同,字迹各异,说明不是文秘书人员代笔。(2)张学良八次签押的时间相差五年,但同为一人手迹。1993年11月枣庄市政协编印的《中兴风雨》一书,收录了张学良给中兴公司的一封信,经对照系出一人之手。(3)民国五年(1916年)张学良15岁开始担任公司主任董事、总公司主任之职。此时正是奉系军阀击败直系,奉系首脑驻节就津,中兴公司机关又正好在天津办公,张学良完全有时间、有条件签押公司文件。张学良的亲笔签押不仅在于书法的优秀,更主要是他本人对历史的重大影响。1928年,其父张作霖在皇姑屯罹难,张学良主政东北,先是排除阻力,完成东北易帜,粉碎了帝国主义分子分裂国家的阴谋。之后于1936年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完成了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的一番伟业而名垂千古。字以人贵,见其字如见其人。先生作为轰动历史的一代巨匠其人其字必然越来越为后人所推崇和景仰。且先生工于书法,“学良”二字神态奔放,如龙腾虎啸,跃然纸上。其他参与签押的人员,有的既是中兴公司首脑,又是重要的历史人物。如公司董事会会长、总经理朱启铃,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总理,总经理钱新之为政学人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金融界首领署理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陈景韩为上海《申报》总编,蒋介石的师友。另有朱启铃的亲笔信,大总统黎元洪之子黎绍基的签名信也都收入这三卷档案。这些北洋名士、金融巨子供职中兴,留下了难得的墨宝。这不仅中兴公司的重要历史资料,而且是学术界关于民国史研究、张学良研究的重要资料,极为珍贵。

三是内容丰富,资料详实。三部卷宗41件文牒,客观反映了中兴公司的管理体制、工作程序和严格的办事制度、精细的工作作风,于我们今天有诸多借鉴之处。同时通过这些档案还可以看出公司当时的生产规模、产品品种、产品价格以及与京津、沪杭地区国有场所、私营企业的往来。包括货物运送方式、交货形式、结算办法等等。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真实资料。同时,这批档案的发现,还纠正和弥补了《枣庄矿务局志》的个别错误与不足。

四是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这些档案虽然距现在有七、八十年的时间,但它毕竟是上一个时代的东西,其书写工具、行文格式、语言风格与现在截然不同,尤其是内中的书法艺术不可低估。因诸多文牒系出众人之手,真草隶篆汇集一册,蔚为大观,令阅卷者叹为观止。另在其中还见有一件重要的夹带,即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10月18日,江苏省立渔业实验场来函的天头上,打印着孙中山先生的《总理之渔业计划》,全文280字,反映了孙中山先生在北起安东、南止钦州的沿海一线,每平均100英里建一渔业港的宏伟构想,为研究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思想提供了一份重要资料。总之,这批档案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文物收藏价值。



年轻时的张学良



1937年王公祠在湖南新田县落成时,地方政要合影留念